

阿格妮丝·赫勒 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梁 秋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010; 东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哈尔滨 150030)

[摘 要]赫勒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与批判是从阐释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及其之间的关系开始的,在赫勒看来,现代性是异质的和多元的,它由技术的逻辑,政治统治(权力)的逻辑,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的逻辑构成,这三种不同的逻辑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保持平衡不被打破是现代性存在的基础。然而,在当代社会,现代性的三种逻辑之间脆弱的平衡已经被打破,造成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与此同时,历史的宏大叙事已经走向了衰落,出现了后现代政治状况,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赫勒从后现代视角出发,诉诸后现代历史意识的培养和生成,强调在后现代的异质性中重建多元性的统一,从而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性;多元性;后现代历史意识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1-0055-10

对现代性问题的阐释、反思与批判是19、20世纪理论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他们分别从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层面探讨了现代性的产生、现代性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现代性的危机以及现代性的命运,包括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时至今日,现代性问题仍然是理论家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人们发现,当代我们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都与现代性问题纠缠在一起。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尼采、马克斯·韦伯、福柯、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尽管他们都对现代性问题用不同的话语方式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释,但是当我们真正面对现代性本身时仍然不能完全揭露

[收稿日期]2019-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理论在东欧的发展与演变研究”(17CKS025);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及其启示”(17KSE334)

[作者简介]梁秋(1981-),女,黑龙江海伦人,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讲师,从事俄罗斯哲学、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出现代性的全貌。

在对现代性问题阐释的整个理论图景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相关问题的理解独树一帜、见地独特。这其中,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和她的丈夫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是比较杰出的代表。他们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赫勒。除了《现代性能够幸存吗?》(*Can Modernity Survive*),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赫勒还陆续发表了《历史理论》(*A Theory of History*)(1982)、《碎片化的历史哲学》(*A Philosophy of Fragments*)(1993)、《现代性理论》(*A Theory of Modernity*)(1999)等著作,详尽地阐释了她对现代性的理解。赫勒对现代性问题的阐释首先是从揭示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入手的,通过阐释这三种逻辑,赫勒指出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异质性和多元性,现代性三种逻辑之间的动态的、脆弱的平衡是现代性继续存在的前提,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现代性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现代性也将不复存在。赫勒认为,现代社会,现代性的三种逻辑都超出了自己的界限,平衡难以为继,因而,必须通过对现代性自身进行反思,培养一种后现代历史意识,在现代性中重建一种多元性的统一,才能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这其中,民主政治和公民道德显得尤为重要。

一、现代性及其三种逻辑

赫勒对现代性问题的阐释,一方面在于解释什么是现代性;另一方面在于揭示现代性的危机,立足于后现代的视角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在她看来,现代性首先表现为宏大叙事,表现为理性化的建构,这是一种力图全面系统地和整体性地解释世界并且一劳永逸地理解全部社会问题的方式。同时,现代性作为理性化的设计,既是欧洲的产物也创造了欧洲,因此,它为欧洲的历史提供了普世性原则,使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欧洲历史也因此而被解释成世界历史。除此之外,现代性还具有时间特性,它表现为一种单线的、不可重复的时间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历史进步论占据了历史意识的核心。基于这些方面的特点,赫勒指出,现代性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在历史观上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目的论,是在人之外对历史的解答。从政治上来看,“宏大叙事……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表面上是依据因果关系,暗地里却是根据目的论的自信”^{[1]2},这势必会导致哲学和政治学上的先验论。现代性主张以“救赎政治”来解决社会问题,所谓“救赎政治是这样的政治,在其中,单一的最终姿态被视为对社会和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所进行的最终救赎的承载者”^{[1]39}。

赫勒不但阐释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同时也认为现代性是异质的和多元的。她在《现代性理论》这部著作中通过阐释现代性的动力与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具体解释了现代性的异质性和多元性。赫勒指出,现代性的动力是“非辩证的辩证法”,即启蒙的辩证法。正是在启蒙的动力之下,前现代的按照社会等级划分的社会格局被现代的按照社会分工划分的功能性的社会格局所取代,传统和固定的信念以及价值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生存境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动力与现代性的格局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出的三种不同的形态就是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即技术的逻辑,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的逻辑,以及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

首先,技术的逻辑。赫勒指出,现代性开始于理性主义的启蒙,现代世界是理性的,是利用理性看待世界的,是合理化的,而理性主义的启蒙又“依赖于作为现代性之‘始因’的技术”^{[2]69}。于是,赫勒引用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看法,认为技术并不是机器,也不是“技术性”,技术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技术是工具,是揭示事物和思考真理的方式;技术是内化于现代人思维方式之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技术的逻辑支配下,现代人不仅把自然界当成一种能量的长期储备来看待,人本身也成为一种长期储备,其结果必然是“整个宇宙被工具化了,或者说作为一种‘长期储备’等待着随后被工具化”^{[2]102}。赫勒指出,技术日益发展的前提是科学的发展,随着技术逐渐进入到历史意识中,科学进而成了“支配性的想象机制”,它取代了宗教上升到了“支配性解释世界的地位”^{[2]104},于是现代社会就变成了“由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所造就”的“世界图景”,科学行使着解释世界的基本职能,形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格局。赫勒进一步指出,科学作为支配性的世界解释方式,它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其表现为:第一,科学变成了“权威性的参照点”,这意味着只有被科学所证明的才是真实存在的,只有科学的才是可靠的,科学代替价值成了一种权威信念。这就导致任何一种理论都试图通过科学来证明其真理性(包括纳粹的种族意识形态,等等),从而忽略了价值本身,科学思维开始支配人的心灵。第二,作为支配性的世界解释,科学并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科学体制的精神”^{[2]113}。在科学体制中,科学和真理都是被生产出来的,即“科学的话语在制造真理”^{[2]113},这意味着科学被合法化,真理的合法性基础变成了一群科学家的普遍接受,科学家具有了评价一种知识或者理论是否为真理的话语权,科学具备了权力的特征,成了支配性的力量。第三,科学作为支配性的世界解释及其话语权力特征不仅在“硬科学”领域起作用,也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适用,并且逐渐渗透到对人自身的解释中。这样一来,对人的解释就不再是一种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探索,而是把人变成了“科学、医学、实验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运动场”^{[2]114}。赫勒借助福柯“科学即力量的观念”重申了,科学作为支配世界的解释不仅仅是因为它压倒一切、无所不包的合法化,更是因为它具有了支配性的权力,科学通过各种制度支配着广泛的领域,而这些制度也把科学及其运用体制化了。赫勒强调,通过合理化以及最优化概念来塑造社会及其他制度,使科学成了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任何社会科学如果按照这种“硬科学”的标准来建构或者对“硬科学”进行模仿的结果都是破坏性的,她举例道:即使科学的方法被运用到监狱中,囚犯也不会变成诚实的公民;精神病人被规范化,他们也不会变成身心健康的人。

其次,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划分的逻辑。赫勒认为,在现代性动力的作用下,前现代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社会等级制度变成了按照人的才能和劳动能力重新安排的社会格局,这种逻辑是现代性的核心。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等级被取消,人成了被抛入的偶然性存在,并且人实际上是作为自由的个人在发挥社会功能,在社会机构中,存在着原则上平等的竞争机会,人们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取决于人们在社会中获取的地位。

赫勒把市场看作现代性的基本机制中最核心的东西,即“市场关系的共通化和普遍化——个人私有财产、私法和人权”,市场是无所不包的,没有任何一种现代性制度是在市场之外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其中之一。在她看来,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意味着人通过在等级性构成的体制中选择一个位置,从而把自己放在市场上进行分配,靠着出售自己的能力获

得相应的社会财富,这种地位、功能、财富和权力的分化貌似是平等的交易,但它终将导致人的等级制。赫勒认为,人们在一个体制中所行使的基本功能的分化与其在管理和控制那些基本制度本身的机会的不同层次相对应,这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有控制权和管理权,私有财产和市场的关系共同规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与此同时,现代性的社会关系呈现出了货币化的趋势,表现为人自身的货币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货币化,人的价值的货币化和量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量化,资本主义制度越是发展,这种情况就越是严重。并且,货币化趋势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还逐渐向人类关系和个人价值的货币化趋势上扩张,呈现出了全面化的趋势。社会关系和人的关系的货币化还导致了人的需求的异化。在前现代社会,人们所有需求的满足都是按照等级进行分配的,包括财富、权力和名望。但是在现代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人们获得了选择的自由。随着货币化趋势的出现,人们开始驱逐于货币,并且开始无限制地贪图财富、权力和名声,甚至认为这些都是能通过货币来满足的,人们甚至认为友谊、爱和尊重这些需求的满足也可以通过财富、权力和名声来实现。

除此之外,赫勒指出,现代性的第二种逻辑还有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专业化,在这方面,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地位的获得依赖于这个人所掌握的技能 and 所接受的教育,这就意味着教育的目的只需要锻造适应这些不同社会功能的个人即可,音乐、诗歌和哲学等通才教育变得没有价值和不被需要。赫勒认为,专业化的教育尽管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却把人变成了像动物一样,只在某一方面专业化的,这严重违背了人的本质,她赞同黑格尔把现代社会定义为“精神动物的王国”的说法,认为“人作为一个精神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通才。不过,在现代精神动物王国里,人就像动物一样变得专业化——而这是违背其本质的”^{[2]132}。

另外,赫勒认为,现代社会格局区别于前现代社会格局之处还在于,前现代的社会格局给人提供了不同的成功渠道,现代社会的格局虽然是多元主义的,但是只有一种生存之道,就是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占据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完全取决于其在教育过程中获得的技能和职业能力。由此,现代性的第二种逻辑越是发展,支配性和压制性的力量就会越强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便会导致整个现代性的社会格局变成一个微观的权力场。

最后,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亦即政治的逻辑,在阐释政治的逻辑问题时,赫勒首先对政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现代性能够幸存吗?》这本著作中,赫勒详细地阐释了自己“关于政治概念的重新思考”,她首先明确了自己对政治概念的理解与施密特、卢卡奇、海德格尔、阿伦特等人都不相同。施密特将政治理解为“二元性的‘朋友和敌人’”^{[3]135},即对某人而非某物的支持与反对。卢卡奇和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将政治“看做是一个团体的本质和存在的同一性”^{[3]137},一个卓越的政治行为被理解为“集体的实体选择它自己并因此选择它自己的命运”^{[3]137}。这个集体的实体在卢卡奇那里是无产阶级,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德国民族。但是这样理解政治的范式在赫勒看来必将导致对个体良心和自由的压抑。汉娜·阿伦特将政治的概念理解为“作为活动的行动”,这些活动包括“直接的行动、讨论和理论的活动力”,政治最重要的时刻就是革命,但

是这种革命绝不是暴徒政治。在区别了这些政治概念的基础上,赫勒认为,真正的政治概念在前现代社会中从未存在,现代性才是政治哲学实现的时期,现代政治的概念就是从现代政治动力的精髓中产生的。赫勒继而指出,在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自由,现代的政治概念就是指“公共领域中自由这一普遍价值的具体化”^{[3]146},即自由的具体化只有在公共领域发生时,它的本性才是政治的。这里,赫勒理解的政治概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在公共领域中发生;彰显自由的普遍价值;任何人只要把任何事情放到公共领域中讨论、论辩或解决,那么它就变成了政治的,这几个特征必须完全具备才能称其为是政治的。她指出,一项议题如果仅仅存在于公共领域,但是与自由没有任何关联,也只能是政策,而不是政治;相反,一项议题如果只是自由的具体化,也不具备政治的特征。一项议题只在公共领域被提及却没有与自由的具体化相关联的是专制国家;而一项议题仅仅体现为自由的具体化而不具备公共特征的是完全的极权主义社会。赫勒强调:政治在实质上并不是某种具体的政治“事情”,“而是现代性本身主要的动力机制”^{[3]147}。在《现代性理论》中,赫勒在阐释现代性的三种逻辑时再次重申了她对政治的理解,她认为政治是有关“对自由(如果被提升到公共领域)的确定的每一种行为、讨论和决定等等”^{[2]161},并且再一次强调了对共和制政治的赞同,她认为,共和政治之所以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就在于“共和主义关系到通过把自由问题提交到公共领域而对他们进行‘政治化’”^{[2]161},共和政治“缔造自由”,在共和阶段没有某一种政治制度是长期有效的,人们积极投身于行使自己自由的活动中,在“缔造自由”之后,政治将会被日常化,当作日常事务被执行,政治将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由此,赫勒认为,现代的政治将不再是一种宏大叙事,而是由所有公民自由参与的讨论和对话构成,作为微观的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无须成为一首对显而易见的重大事件的赞歌,也无须成为杰出的政治运动的赞美设计”^{[3]150}。

二、现代性三重逻辑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及其后果

赫勒认为,现代性的这三种逻辑既相互区别又交织在一起;既相互支持又相互限制,甚至有时候会相互冲突。它们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图式”,这是现代性存在和发展下去的主要原因,没有这三种逻辑之间的相互限制,“现代性很快就会摧毁其自身”^{[2]196}。赫勒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三种逻辑都有突破自身限制,打破平衡的可能性,并且有些情况在现代的社会中业已存在。

首先,技术作为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已经使“整个宇宙被工具化了”,并且“技术想象和思想把真理对应理论提升为唯一支配的真理概念”,从而把科学提升到了“支配性解释世界的地位”^{[2]104}上,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成了“(1)权威性的参照点(真理生产),(2)支配性制度之网络(真理的生产和分配网络),(3)一种权威模式”^{[2]111}。不仅如此,社会科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也开始科学化,科学也具备了意识形态的特征,造就了当今的世界图景。赫勒强调,当科学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解释世界的模式后,尤其是当科学成为实践、制度和行动的模式后,技术的逻辑同现代社会中地位分配的逻辑就会产生冲突和矛盾。

其次,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的划分逻辑表现为异质性,它的相对

独立性是现代性继续存在下去的决定性因素,当这种逻辑受到限制的时候,就会导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意味着不同机构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的差异被消除,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的同质化,致使现代性的发展失去动力从而走向毁灭。

最后,政治权力(统治)的逻辑不能无限制地扩张。赫勒认为,“政治制度不能出口”^{[2]111},如果无限地扩张必将会导致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出现,例如希特勒的独裁政府。至于为什么政治制度不能出口,赫勒解释道,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的最高来源就是基本法,但是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法律的制定必须体现本民族的精神和这个国家的文化与历史传统。也就是说,由于在民族精神等方面的差异性,政治制度上必然要有差异性和多元性。赫勒强调指出,极权主义国家是一种专政,极权主义专政往往通过把自己定义成革命的而宣称自己带来了一种新的秩序。在极权主义国家出现了独裁者,在极权化的社会中,多元主义或许存在,但却是不合法的,即它没有存在的权利,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极权社会合法性的标准乃是独裁者的冲动和情绪。同时,极权主义专政有可能带来恐怖主义,极权主义政权通过战争维持,极权主义国家在规划上追求一种普遍主义,即他们的目标是征服全世界。在这样一种伴随着恐怖主义的普遍主义驱使下,极权主义政权制造了灭绝机制,制造了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政策即是如此。

从上面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赫勒对现代性三种逻辑的探讨,一方面说明现代社会,现代性出现了异质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说明现代性的三种逻辑之间的界限和平衡已经被打破,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社会,这是现代社会的明显特征。赫勒指出,前现代社会秩序被打破后,在新的社会安排中个人都变成了偶然性的存在,无限的偶然性赋予人极大的选择的自由;社会安排也是偶然性的,即所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安排以及生存在其中的人都可以是存在的,也可以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双重偶然性会导致一定的社会安排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当人们选择了某种制度安排,就意味着要“面对逐渐消失的偶然性以及总在减少的新的开端的机会”,“境遇会成为人们选择他们喜欢的道路的障碍,并且某种偶然性永远不会发生在那些已经选择了某一特殊生活道路的人身上”^{[1]23}这就导致,在期望和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期望是偶然性的,而经验是生命的严酷事实,是偶然性的界限,所以,二者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异是导致不满的根源。由于期望经常提升,所以这个鸿沟越来越宽。并且,“令人不满意的社会”还代表着普遍需要的不满。在赫勒看来,普遍需要的不满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自然它也构成了西方现代性中三种不同逻辑发展的推动力。在社会中,假设人们停止对自己命运的不满,社会就无法再生产自身进而进入衰退或解体的时代,并最终导致崩溃。并且,现代性的动态平衡被打破,现代性能否幸存,人类社会的走向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难题,甚至是灾难。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成了赫勒不能回避的理论任务和现实责任。

三、宏大叙事的衰落与后现代意识的形成

(一) 宏大叙事的衰落与后现代政治状况的出现

赫勒指出,现代性的异质性和多元性,现代社会现代性的三种逻辑之间动态平衡已经被打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它意味着自启蒙以来理性主义所形成的宏大叙事已经走

向了衰落,20世纪以来的历史现实都说明了人们不能对历史进步论再持续地抱有乐观主义的情绪,奥斯维辛和古拉格都说明了这一点。

赫勒认为,在现代性想象机制的支配下,未来被想象并设计成了自由而充满无限创造的领域,现在则被边缘化为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或者仅仅是对未来的一种限制以及实现未来的手段而已。对于这个问题,赫勒做了一个比喻:“现在就像是一个火车站,我们这些现代世界的居民需要坐上一列快车经过这个车站,或是在此停留片刻,那些火车会把我们带向未来。停在火车站将意味着滞留。”^{[2]17}并且,现代性借助于科学知识树立了社会进步的信念,而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其中的关键。赫勒指出,这种社会进步观念实际上是一种隐藏的历史目的论,现代性表现为一种对进步的崇拜和对目的论的信仰,现代性借助于未来取得了合法性的基础。赫勒进一步指出,现代性的这种想象机制是基督教的《启示录》与“希腊的 karios(适当的时机)”二合一的现代版本,这种结合的想象带来的结果是毁灭性的。因为,首先,基督教启示录式的想象诉诸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上帝的到来,其中没有人的地位;其次,希腊人的历史观念是一种循环的历史意识,它没有历史完成的思想,因而也谈不上“未来”的概念。这种神的形象的结合和统一为奥斯维辛和古拉格提供了合法性机制,是对“道德/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僭越。因而,奥斯维辛和古拉格变成了列车的终点站,这证明了现代性合法化的破产,天国不但没有降临,尘世还变成了地狱。极权主义和种族灭绝的现实切切实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除此之外,赫勒认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使社会逐渐变成了一种多元性和异质性的社会,许多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如贫富差距、战争、种族、性别、宗教、年龄歧视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这种社会境遇,被她和费赫尔称为后现代政治状况。后现代政治状况在生成后现代意识的同时也造成了意识的无根性,所以赫勒在正视后现代意识的同时也强调了要在多元基础上重建一种统一。

(二) 后现代历史意识的生成与多元性统一的重建

如何面对宏大叙事的衰落,反思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想象机制,继续保持现代性的三种逻辑之间的动态平衡,把偶然性转化成命运,从而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是赫勒进一步思索的理论问题。对此,赫勒没有诉诸现代性之外的因素,而是从现代性本身入手强调对现代性意识的自我反思,即后现代历史意识的生成。赫勒认为,“现代性不能被埋葬,因为它从未死去;相反,它只是弄清了自己的决心”^{[1]183},并且“对现代性的进步主义合法化并没有轰然倒塌”^{[2]20},而是逐渐地发生了历史意识的缓慢变化,即已经出现了后现代历史意识,培养后现代历史意识是现代性能够继续幸存的希望。

对于后现代,赫勒认为,它与现代并不是完全不相干和对立的,现代与后现代也不是时间上先后相继的概念。在她与费赫尔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中,他们对“后现代”做了明确的解释:后现代是现代自身的完成和反思,“后现代既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也不是一个特征清晰的文化或政治思潮……后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广阔的现代性时空内的私人-公共时空(private-collective time and space)”^{[1]1},也就是说,后现代性是在现代性当中生长和孕育起来的,“后现代性(包括后现代政治状况)并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现代性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寄生’在现代性之上的,它依靠从现代性的成就及困境中汲取养分

而生存”^{[1]13}。在《现代性理论》中 赫勒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后现代性并不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的一个阶段,它不是对现代性的补救——它是现代的” 后现代性是“现代性意识本身的自我反思”^{[2]13}。赫勒认为,后现代意识是历史意识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拥有后现代意识的现代人立足于偶然性解构宏大叙事,并不认为历史中存在着必然性的规律,“历史事实和事件都是偶然的”^{[2]15},因而也不持有在规律支配下历史必然会向某一个方向前进的历史进步主义的信念。

后现代人立足于现在,“接受在车站上的生活”^{[2]20},他们并不期待列车把他们带到最终的目的地,因为在他们看来最终的目的地包含着灾难,后现代人认为未来是开放的也是未知的,历史中并不存在某种特殊的特权,科学也不能够给人们带来开启未来的钥匙。后现代人强调绝对的现在,以现在的视角看待过去和未来,并强调要对现在担负责任。对现在负责是赫勒一直强调的后现代人的基本特征,对现在担负责任,意味着一个人要照管“他的同时代人”“他的共生”,这是最有可能被遵守的承诺,因而对现在负责也是一种道德责任。赫勒强调,通过对现在担负责任,后现代人还能把自己的偶然性转化为命运,以此在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社会中获得满足。

除此之外,赫勒还从需要的角度阐释了人们应该如何把偶然性转化为命运,从而在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社会中寻求满足的途径。在她看来,令人不满意的社会中存在两种需要,即合理的需要与不合理的需要。合理的需要是一种“没有仅仅把人当作手段来使用”的需要,它呈现为价值需求,能激励我们实现目标;而不合理的需要则相反,是把人当作手段的需要。合理的需要又分为两个层次:需要和需求。需求“立足于社会权力、财富或者名誉的幻象”,是片面的;需要则不同,它表现为自决的需要或者自决权,而“自决的需要的满足”恰恰是令人满意的社会的来源,也是把偶然性转化成命运的关键。赫勒指出,“令人不满意的社会”以需要和需求的扩张为特征,并且在现代社会,作为激励力量的需要在社会政治舞台中都显示为需求。她认为,当需求、需要被满足时,人们就会把个人的不满转化成公共的、平等和正义的语言,进而要求以新的社会政治规则来代替现有的法律,在期望和经验这道鸿沟之上架起一座桥梁,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她进一步指出,若想在“令人不满意的社会”中获得满足,其途径就是在不放弃需求的同时,寻求自决的需要的满足,而这个过程就是把偶然性转化成命运的过程。

赫勒还认为,“令人不满意的社会”呈现出不断变化的特征,其原因在于“自我推动制度的扩大的自我复制”,结果会导致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把人的偶然性看成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的命运永恒不变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它并不能转化成命运。在赫勒看来,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这种做法具有明显的消解主体的倾向,它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成为“异化的、物样的、具体化的”,成为一个微观权力的力场。所以,赫勒虽然强调现代性的偶然性,但并不认同后现代主义的立场。

在赫勒看来,“异化的、碎片化的”现代社会必然表现为去中心化,即缺少单个的、单一的组织中心,其结果就是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凸显出来了,基于现代社会去中心化的特征,社会革命必然走向多元化的日常生活的变革,一劳永逸地、整体性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或计划将变得不切实际。赫勒认为,前现代社会格局中的“日常生活和制度化

生活之间的差别是模糊的”^{[2]87} ,现代社会则不同 ,日常生活作为我们的基本生活经验 ,可能发展出我们即将要求的需要。现代西方社会这样的特征也导致了无政府主义与救赎政治失效 ,并且 ,人的解放行动的对象变成了日常生活 ,而不再是传统的单一的政治组织中心。现代社会的根基在日常生活之中 ,日常生活的发散性特征使得每一个人的需要和需求结构都各不相同 ,这也就意味着同样的实践不可能弥合多样的期望和经验之间的差距。但是 ,这种需求和需要结构的不同恰恰使民主成为可能 ,这是因为 ,在民主制度中 ,所有的规则和规范都是由社会成员的意志决定的。民主逻辑的发展使人们日益增长的自决需要逐渐得到了满足。

赫勒强调指出 ,把偶然性转化为命运是我们不得不应付的境遇 ,这其中还需要“道德考量”作为条件或途径。在她看来 ,道德是现代国家的产物 ,在现在社会 ,道德要求应该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作为‘人类本身’做某事 ,将他人当做‘人类本身’而为其做某事 ,在作为‘人类本身’的对等、互惠、团结、友谊中 ,与他人一起做这件事”^{[1]69} ,在这个意义上 ,民主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应该保持一致性 ,即都应该体现平等和正义等价值观念 ,只有这样 ,政治原则才能成为多元主义社会的共识 ,而“对道德最恰当的描述是行为的规范和规则的个人实践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公民道德、公民伦理和公民美德。

四、简评

从赫勒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中可以看出 ,赫勒批判传统的现代性理论的抽象化和普遍化 ,她将其称为宏大叙事 ,她强调以历史理论代替强调宏大叙事的历史哲学。与此同时 ,赫勒也开启了反思现代性的微观理论视域 ,这是她强调应用后现代视域避免走向宏大叙事的重要方面。虽然强调后现代的多元性、微观性的重要性 ,然而与后现代主义不同 ,她一再重申 ,后现代主义对多元性的强调很容易滑向极端相对主义 ,因此在反思宏大叙事的同时要拒绝“跳入虚无”和相对主义 ,因为完全否定现代性很有可能导致自由的彻底丧失或毁灭。因而 ,赫勒一直游走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 ,试图在宏大叙事和极端相对主义中间 ,即在后现代的多元性中“寻找那个仍然能够把我们的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寻找一个据我们的猜测也许已经熬过分裂过程的思潮 ,一个能成为极端相对主义反讽解药的思潮” ,“在后现代政治状况所允许的程度内重建现代性的统一”^{[1]15}。

赫勒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立足于 20 世纪人类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 ,即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通过文化自觉地整合成了一个全新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 ,“文化不再是与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外在的、相对独立的、被决定的精神文化 ,而是真正成为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各个领域内在的机理和图式”^[4] ,文化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或消失 ,也就是说客观的社会各领域之间原来相互独立的、分离的存在模式被相互区别又相互交织的异质的、多元的、非中心化的模式所取代 ,这导致 20 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范式的巨大变化 ,即从宏大叙事走向了微观视域 ,赫勒的现代性理论正契合了这一历史趋势 ,自觉地对宏大叙事进行批判并开展了微观视域的历史理解。赫勒不再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宏观的、抽象的理性建构 ,或者是一种抽象思辨的观念体系 ,在她看来 ,现代性在时间上也不再呈现为一种单线的历史决定论或历史进步

论 她赋予了现代性以丰富的历史内涵 ,把现代性同个体的生存境遇关联起来 ,并且将现代性具体化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从社会政治制度、道德价值取向、教育、科学、民主、日常生活等层面阐释了现代性的具体性。赫勒拒斥现代性的总体性和中心性 ,强调现代性的异质性和多元性 ,同时强调现代性的多重维度和多重可能性、偶然性和选择性 ,也强调现代性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 ,她更多地关注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批判 ,关注现代性的自我修复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现代性问题的开放性的微观视域。

总之 ,一方面 赫勒所开启的理解现代性问题的微观视域对于克服传统现代性理论由于过分重视客观领域而造成的普遍化的和抽象思辨化的缺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与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相适应的社会历史理论应该是宏观范式与微观范式的结合 ,强调微观范式 ,并不是要否定或者取代宏观范式 ,一种合理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应该努力寻求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的融合 ,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对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真实全面的把握。另一方面 ,在赫勒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中 ,她将马克思看作是宏大叙事的代表 ,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其自身的主观需要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解读是在现实需要的指导下进行的 ,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解读马克思时带有某种程度上的主观目的性和偏颇性”^[5] ,在理解马克思的过程中 ,我们也应该避免完全基于赫勒来理解马克思。

[参 考 文 献]

- [1] [匈]阿格妮丝·赫勒 ,费伦茨·费赫尔.后现代政治状况[M].王海洋 ,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2] [匈]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理论[M].李瑞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 [3] [匈]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能够幸存吗? [M].王秀敏 ,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 [4] 衣俊卿.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J].中国社会科学 2011 ,(5):40-51 220-221.
- [5] 杜红艳.马克思思想的结构主义解读之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 ,(1):121-128.

(责任编辑:杜 娟 杜红艳)